

利类思、万济国和神学术语的翻译

Ludovico Buglio, Francesco Varo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ological Terms

[奥地利]雷立柏 中国人民大学

Leopold Leeb,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Ludovico Buglio, SJ (1608 – 1682) and Francisco Varo, OP (1627 – 1687) were important translators and theological authors.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Buglio in Beijing (ca 1648 – 1682) and Varo in Funing (ca 1649 – 1687) are a witness to the rise of a theological language in China. Buglio's main achievement was the partial translation of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into Chinese, in which he already employed a rich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rminolog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ancisco Varo has, among other works in Chinese, elaborated a Spanish-Chinese dictionary, which was re-edited by W. South Coblin in 2006. This short study is based on Buglio's translation of the *Summa Theologiae* and Varo's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 A comparison of the theological language used by both authors shows many similarities,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mid 17th century a common theological language was used in North and South China by both Jesuit and Dominican missionaries. Terms like “linghun” (soul),

“xinde” (faith), “shengshi” (sacrament) or “chaoxingde” (theological virtue) were used by both Varo and Buglio, and are still in us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of China today.

Despite their success, the influx of new terminology and new thought through the efforts of Buglio, Varo and many other tireless translators did not lead to a Chinese Renaiss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Even today, few Chinese translators bother to study the etymology of the theological terms they are using, which would involve a serious study of old European languages, which have shaped theological thinking: Latin, Greek, and Hebrew. What did terms like *religio*, *lex*, *providentia* or *amor* mean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These kinds of study would raise awareness among Chinese translators today regarding issues of the translatability or 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rms.

4

一、Buglio(利类思)和 Varo(万济国) 的生平和著作

意大利人 Lodovico Buglio 生于 Sicilia。^① 他 16 岁时就入耶稣会, 1637 年入华, 先在江南传教, 1640 年奉派到四川, 大概是第一个在四川传教的欧洲人, 与 Gabriel de Magalhaes (安文思, 1610—1677) 一起传教, 在许多地方建立教会。1643 年张献忠占领成都, 影响两个人的传教工作, 最终他们于 1648 年到北京, 后在首都协助 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等人在新的政权 (清人 1644 年入

^① 关于 Buglio 的资料多来自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 - 1773* (上海 1932, 汉语版,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北京 1995 年)。

关)的条件下进行传教。他在 1655 年获得了一块地并能够建立一所小教堂(现在的“东堂”)。传教士们的一些主张受某些人的攻击,其中最突出的是杨光先。杨光先于 1665 年前后引起的“历狱”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全国所有的传教士被押送到广州,禁止在内地传教。在北京地位最高的传教士是 Schall(汤若望),他因“历狱”入狱,而只有 Verbiest(南怀仁)、Magalhaes(安文思)和 Buglio 被允许留在北京。Buglio 在北京 35 年,他的著作有 25 种,其中篇幅最大的无疑是 Summa Theologiae 的翻译本,名为《超性学要》,共 30 卷。其他的著作是:《弥撒经典》5 卷(其中包括一个圣人节日的名单,有 227 个圣徒的汉语译名),《七圣事礼典》1 卷,《司铎日课》1 卷,《司铎典要》2 卷,《圣母小日课》1 卷,《圣教要旨》1 卷,《灵魂》6 卷等等。^①《神学大全》的翻译可能是在 1645 年就开始的^②,而《超性学要》是在 1654—1678 年间发行的。Buglio 没有翻译原著的全部内容,可能仅仅翻译 20%,但他翻译了几乎所有的命题的标题。在托马斯的著作中出现很多反对正统信仰的观点,而 Buglio 没有翻译这些,以免中国读者感到困惑。翻译托马斯的名著的目标可能是为中国圣职人员(司铎)提供一些教材和阅读资料。Magalhaes(安文思)帮助他翻译其中关于“复活”的部分(《复活论》)。《超性学要》在汉语的学术界可能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但在 1930 年这部巨著被重新发现(“after 250 years of oblivion”)^③并在上海重印。^④

①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卷,第 245 页。

② 参见 N.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在华基督宗教手册》), vol. 1, Brill, 2001, 第 613 页。

③ 同上,第 614 页。

④ 本研究所用的就是上海 1931 年的重印版。

Buglio 的传统是耶稣会的传统,而在他之前早就有一些汉语的神学著作或包含神学术语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可能是 Ricci (利玛窦)于 1603 年发行的《天主实义》和 Aleni(艾儒略)于 1628 年印行的《万物真原》。Ricci 和 Ruggieri(罗明坚)曾在 1580 年代编撰了一部《葡萄牙语汉语字典》,而 Ricci 又在 1598 年写了一部《汉语葡萄牙语字典》,用罗马字拼音和根据 ABC 的编排法。

西班牙人 Francisco Varo (万济国)出生在 Sevilla。他曾在 Mexico(墨西哥)被祝圣司铎(可能是 1646 年或 1647 年),通过菲律宾而到达福建(1649 年)。他前后在福建传教 40 年,而他的主要基地是福宁。在 1665 年的“历狱”中,有 4 位山东和浙江的道明会会士被押送到北京,后与 21 位耶稣会会士一起押送到广州,但 Varo 和 Buglio 类似地能够回避这种灾难。福建的道明会会士(当时只有 8 个人)能够隐蔽自己,这样逃脱危险。Varo 在 1670 年被捕入狱,但于 1672 年又获得释放。Varo 曾被指定为“广东、广西、云南的宗座代牧”,但当这个消息到达福建时,他已经去世了。Varo 的著作很多,特别出名的是他的汉语语法书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分析南京地区的官话,但不包含汉字,1682 年完成,1703 年在广州印行)和一些词典。他于 1670 年就完成了一部《葡萄牙语汉语字典》(今天只保存一半),完年又写了一部比较大的字典: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 (《西班牙语—汉语字典》)^①。除了这些语法书和字典外,他还写过一部介绍基督信仰的书:《圣教

① 有一位西方学者花几年的时间研究 Varo,就是 W. South Coblin,他关于 Varo 的著作很多,见他的“Francisco Varo and the Sound System of Late Ming Guanhua”, *JAOS* 118: 262-267 (1998);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Francisco Varo's Glossary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2006.

明徵》(8卷,1677年发行)。另外,他也曾写了一篇涉及“礼仪”问题的文章,即: *Tratado* (1680)。这篇文章后来也影响了 Maigrot (闫当) 的思想^①。

Varo 的传统是道明会的传统,而道明会有一些会士很早就开始编写《汉语字典》和学习汉语的资料,比如 Juan de Cobo (高母羨, 1546—1592) 曾在 1600 年前写了一部汉语语法书 (*Arte de la lengua China*) 和一部小字典 (*Vocabulario Chino*)。另一位道明会会士是 Francisco Diaz (1606—1646), 他于 1640 年编写一部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on Castellana* (《汉语字典和西班牙语解释》)。

二、Buglio(利类思)和 Varo(万济国) 所使用的术语的比较

Buglio(利类思)是意大利人,也是耶稣会会士,曾在江南传教,但后长期在北京进行翻译。Varo(万济国)则是西班牙人,是道明会会士,长期在中国南方(福建)传教和写作。他们的神学术语会有什么不同? 他们对于中国传统会不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基本的态度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翻译呢?

根据 Buglio 的《超性学要》和 Varo 的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Mandarina*《西班牙语汉语字典》可以进行他们在神学术语上的比较。^②

^① 参见 N.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在华基督宗教手册》), 第 323 页。

^② 在此我要向 W. South Coblin 的 *Monumenta Serica* 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 Coblin 为 Varo 的字典加上了汉字(原文没有汉字),这肯定是一份巨大的劳苦,但也是伟大的贡献,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拉丁文	Buglio	Varo ^①
amor	爱	爱
angelus	天神	天神
anima intellectualis	灵魂	灵魂
anima sensitiva	觉魂	觉魂
anima vegetativa	生魂	生魂
baptismus	洗涤	圣洗
causa prima	最初之所以然	最初之所以然
christiani	在教者	教中人,从教者
diabolus	邪魔	魔鬼,邪魔
doctrina	学,传教	教,道理
Ecclesia	圣教会,圣教	天主圣教会,公教会
fides	信,信德	信德
haeresis	异端	异端,左道
humanitas	人性	人性
incarnatio	天主降生	天主降生为人,降孕
lex	法律,法	法律,律法,典法
liberum arbitrium	自专	自专
lumen rationis naturae	性明,性光	性光,本性之光,灵光, 明德,良能,良知德光
missa	弥撒	弥撒
obiectum	界,本界	向界,所向界,所属
officium	职分	职分,职任,职位
omnipotens	全能	全能

① 参见拙著《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二部，《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

oratio	祈祷	祈祷,祈求,祈祝,祷祝
oratio vocalis	祈祷以口	念经
ordinis sacramentum	品级圣事	品级圣事
persona	人,位	位
praedicare	讲道	讲道,论道,谈道,讲经
providentia	预图	天主降监,天主的命
resurrectio	复活	复活
revelatio	传示	默示之言,默启之事
sacramentum	圣事之迹	圣事之迹
scriptura	圣经	经典
veritas	真实	真,实,真实
virtus	德,诸德	德
virtus theologica	超性德	超性德

这种比较表明:Varo 和 Buglio 的神学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他们在重要的术语上(比如“复活”,“讲道”,“超性德”,“圣事”等)都用统一的说法和术语,只在那些比较难表达的概念上,他们的文献呈现出不同的翻译尝试,比如:providentia: Buglio 的“预图”是很独特的翻译,而 Varo 的“天主降监”和“天主的命”也算是很特殊的词。一直到今天,providentia 的汉语翻译构成一个难题:“天命”、“天佑”、“上主的安排”等词都有。这种翻译的困难表明这样的事实:在汉语思想传统中并没有一个与拉丁语 providentia 相通的或相等的概念。

三、关于翻译方法的一些观察

17 世纪的传教士们使用一个很“先进的”翻译方法:他们结合

两个(或三个、四个)汉字,这样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法律”、“觉魂”、“天神”、“复活”、“圣事之迹”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新的概念符合了从外面来的外文观念(比如 *lex*, *anima* 等),这样在语言方面开始进行“全球化”。另外,这些组合的观念比古汉语单字的观念(如“道”、“学”、“礼”)更精确,可以形成一个知识体系,一种“学科”。19 和 20 世纪的汉语译者都用了这种方式,而现代普通话中的许多概念都是这样来的:“宪法”、“进步”、“社会”、“发展”、“大学生”等等。

然而,在某些观念方面,传教士们想利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比如 Buglio 用“天学”来翻译 *theologia* 和“性学”翻译 *philosophia*。这样,中国的儒者会感觉到,基督宗教的神学所谈论的内容与儒家传统中的“天”和“性”有关系。这样传教士们能够获得社会上的认同,但也许很难保持他们教导的特殊性。因此,耶稣会最伟大的翻译者之一,Giulio Aleni(艾儒略)在其《西学凡》(1623 年发行)中译 *philosophia* 为“斐录所费亚”(“斐”应写为“非”加“女”,因为我无法造字不能在电脑上写,但这个“女”令人联想到《旧约》中的“智慧女士”*hokma*, *sophia* 和 Martianus Capella 的名著 *Denuptiis Mercurii et philologiae* 中的“女神们”)。Aleni 译 *theologia* 为“道科”,又译为“陡录日加”,将 *rhetorica* 译为“勒铎理加”,将 *logica* 译为“落日加”或“明辨之道”,将 *physica* 译为“费西加”或“察性理之道”,将 *metaphysica* 译为“默达费西加”或“察性之上之道”,将 *mathematica* 译为“马得马第加”或“几何之学”,将 *ethica* 译为“厄第加”或“修齐平治之学”,将 *medicina* 译为“默第济纲”或“医科”,将 *lex* (*leges*) 译为“勒义斯”或“法科”。很遗憾的,后来的译者很少用“斐录所费亚”这个词,而多用“名理学”、“性学”等等。如果天主教的译者在 17 世纪形成一种“斐录所费亚”和“陡录日加”的传统,中国学人也

许会早一点问这个词的词根,这样对外语比较有兴趣,并且会意识到,外面传进来的新知识和本土的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别。

当然,17世纪的外国译者都有这样的困惑:他们的著作很容易被控告为“邪教”的著作,所以他们在写作和术语方面必须尽可能靠近传统的儒家表达方式。现代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们:“明清之际的基督教‘本地化’并非出于自觉,而多半只是‘适应’传教策略的自然延续,或者是在强大的儒学传统面前的权宜之计。”^①实际上,无论是 Buglio 或 Varo 或其他 17 世纪的传教士,他们都生活在明清的中国,就是曾引起多次“文字狱”的政权之下。他们面对的不是元代的开放中国,而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封闭自己的“天朝”。比如,耶稣会的传教士早在 17 世纪初想介绍拉丁文字和汉字的拼音法,而“《西儒耳目资》既出,国人欢迎甚”^②,但很快有中国士大夫写文章反对拉丁字母。^③ 反对拉丁字母和抵抗研究外来概念的原文在今天(2007)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强烈的力量,而许多学生和学者用汉字和汉语传统来理解西方传统。他们并没有想到,为了理解所谓“西方文化”应该学习一点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这样的例子太多,我 2006 年年底在北京参加一个讨论会,名字为“科学,信仰和教育”,其中有一位学者说,“科学”不应该理解为“知识”,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到“赛先生”就是来自拉丁文的 scire“知道”,但也想到汉语的“科学”也许被理解为与“科举制度”有关系的“做官发财”的工具。由此可见,用汉语来理解外来的神学概念隐含着相当大的危险:误解和歪曲的危险:“基督教的理想一旦被这样的(即:儒家传统的)道德学说加以阐发,在适应汉

① 杨慧林,《圣言·人言,神学诠释学》,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第 212 页。

② 方豪,《方豪十六自定稿》一卷,台北学生书局,《拉丁文传入中国》,第 3 页。

③ 同上,第 6 页:“拉丁字注音之遭反对”一段。

语语境的同时必然要背离自己原本的信念。”^① 如果仅仅以汉语的传统(儒释道的传统)来理解基督宗教的种种概念,其解释必然是很有局限性的^②。比如,“信仰”在外文中含有 *sancta fides*“神圣信仰”的因素,而公元前 240 年的罗马城就一个座献给 *Fides* 女神(即信用女神)的庙,但儒家的“信”无法阐明这些层面。

北京大学的汤一介老师曾经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本来没有宗教,只有‘宗’和‘教’,就是说有很多佛宗,也有儒家的‘教化’。”这种说法很有启发,但是从汉语的传统出发的。如果查一本拉丁语辞典,我们就能够知道, *religio*(宗教)的意思是:(1)顾虑;(2)宗教上的 *scruples*“良心不安”;(3)认真的态度,即 *conscientiousness*; (4)对神明们的情感;(5)外在的敬拜;(6)迷信;(7)共同的 *cult*; (8)圣像;(9) *the holy, holiness*(比如某一个地方的);(10)神圣的义务;(11)誓言, *ius iurandi*; (12)罪和诅咒。^③ 在这 12 层意义当中就有好几个在翻译中会构成问题,比如 *scruples, conscientiousness, cult, the holy* 等等。汤老师说,在中国没有“宗教”,而 *religio* 这个概念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难以翻译的概念。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这样的:通过 20 和 21 世纪的大量翻译工作,汉语中的“宗教”会潜移默化地接近西方语言中的“宗教”,也就是拉丁语的“*religio*”。从这个角度来看,汉语的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是

① 杨慧林,《圣言·人言,神学诠释学》,第 209 页。在这方面,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邓晓芒曾写过一篇关于 20 世纪华人学者对“科学”、“理性”、“实践”、“自由”等概念的歪曲和误解,见《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载《世界哲学》,2002 年增刊,第 7-17 页。

② 参见德国汉学家 Trauzettel, “Personen- und Individuumsbegriff in China und dem Westen”, in: Z. Wesolowski ed., *Personen- und Individuumsbegriff in China und im Westen*, Taipei, Fure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2006; pp. 58-150.

③ 见 Rita Hau ed., *Pons Universalwoerterbuch, Lateinisch-Deutsch*, Klett Verlag, 1995, 第 886-887 页。

汉语的拉丁化,虽然可能只有很少人意识到这个发展过程。

西方传教士大多没有选择 Aleni 的音译路线,但根据“靠近汉语传统”的翻译来创造基督宗教的汉语神学,一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并且首次形成了一些今天仍然通用的概念,比如“人类”,“行为”、“选择”、“大学”、“地理学”、“法科”、“医科”、“植物”、“字母”^①等等。^②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靠近汉语传统”的翻译方式没有引起华人学者对原文的广泛兴趣,也妨碍了西文在华的传播和学习。在华虽然早在 1388 年就出现了一本双语的字典(《华夷译语》,一本汉语蒙古语字典),但学习“斐录所费亚”和“陡录日加”的原文和原义一直到今天(2007)并没有点燃起汉语学人的心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字太受重视。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当中不能不采取华人的方式:用汉字来理解外来的思想,这样进一步地促成汉字那种“压倒一切”的威力。在 1979 年以后的中国虽然有很多学者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但他们仍然没有离开“以汉字代替一切外来的因素”的老传统。比如,很多外文的人名、地名、书名在翻译的时候没有保留原名,这样无法追究它的根源和原来面

① “字母”,即 ABC 是 Trigault(金尼阁,1577-1628 年)在其《西儒耳目资》第一次用的术语,但很快有华人学者反对说,如果有“字母”,也会有“字父”、“字孙”,所以不应该用外来的“字母”,见上方豪,第 6 页。参见拉丁语中“母亲”mater 的一种意识:“来源”,“根源”,与 materia“原料”和 matrix“主干”有关系。

② 参见 Federico Masini, “Alen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 Lippiello, R. Malek, ed,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J (1582 - 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Monumenta Serica, St. Augustin, 1997, 第 555 - 572 页。文章中多次说,某个概念是“Aleni’s creation”。

目。^① 为了提高翻译和学术的水平应该更多提出原文的重要性。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Buglio 和 Varo 的翻译工作和他们的“汉语神学”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启发?

① 参见我对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国际中文版”的评论《制造障碍的汉译》,载《博览群书》,2005(7),第31-33页。很多翻译作法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比如见杨德友翻译 Pelikan 的名著 *Jesus through the Centuries*,《历代耶稣形象》,上海三联,1999,164页脚注:A. Nygren《挚爱与欲爱》。这部名著的原文是 *Agape and Eros*,但用汉字掩盖原文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原文没有兴趣,不尊重原文。